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本书的主题与研究意义

一、本书的研究主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经济时期，目前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曾强调遵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人们也曾笃信“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可以自由地、充分地调节国民经济，使之均衡、协调、和谐发展。然而，历史实践表明，上述两种理想状态未曾真正实现。现实是，总量增长周期波动，结构演变频发失衡，加工产业生产能力时而短缺时而过剩，基础设施建设则一直滞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不足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因而，中国政府曾先后两次大力推行基础设施的倾斜投资政策，第一次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推行以改善投资环境和局部区域发展环境为目的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逐渐增加。第二次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推行的以拉动社会需求为目的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不断增加，其

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进一步增强。然而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各地区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分布很不均衡，由此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存在差异，有些地区推动作用大，而有些地区作用甚微。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大小是政府宏观决策者关注的重点，影响其对基础设施投资决策选择。因而对基础设施投资作用大小的判断是政府及其投资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而又十分关键的问题。本书将系统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计量分析其作用大小，提出合理的投资政策和制度安排。本书力求以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为核心。无论最终对经济科学贡献了什么、贡献了多少，但它的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它恪守经济科学宗旨，尽其所能，潜心求索。本书试图抓住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问题，在充分利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资料的前提下，经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系统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政府部门及投资者提供现实的投资决策参考依据。

二、主题的研究意义

基础设施投资作用问题的研究，对丰富和发展产业经济理论和产业投资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产业政策的核心，是力图调节产业部门的均衡和发展。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保证各产业部门的均衡、协调发展，防止和纠正各部门的失衡状态，以免影响经济的发展；二是“发展是硬道理”。产业政策的目的是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往往需要确定重点产业部门，作出产业发展重点的优先顺序选择^①。基础设施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其投资的

王辰：《基础设施产业融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页。

不足将制约其他产业的发展，导致其他产业部门资源的闲置浪费或资源配置成本过高和低效率。基础设施投资过度则会引起基础设施本身过剩而出现闲置，造成浪费，而其他产业部门投资又受到影响。总之，不管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还是过剩都会影响经济发展。因而基础设施投资应保持适度的比例。笔者认为，基础设施投资适度与否，关键不仅仅在于其投资数量的大小，而应根据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来进行分析。是否将基础设施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以及是否优先发展，应根据投资于基础设施与其他产业，两者中谁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大来判断和选择。选择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研究，可以系统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大小，评价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性，优化投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为实现中国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第二节 前人研究的现状 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国内外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现状

基础设施的经济学分析开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发展经济学家最先对基础设施给予了广泛的重视。平衡增长理论先驱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 - Rodem）在其著名著作（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中首先提出了“社会先行资本”，旨在强调在一般的产业投资之前，一个社会应具备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积累。随后姆里纳尔·达塔—乔德赫里（Monynur. Data. Jordehory）对罗森斯坦—罗丹的“平衡增长大

推进”理论评价时，特别强调了大国的区域差异对基础设施投资布局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中的许多不可控因素对基础设施投资测定带来许多困难。赫希曼（Hirschman）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对基础设施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明确了“社会间接资本”的涵义。他认为广义上的社会间接资本包括从法律、秩序以及教育、公共卫生，到运输、通信、动力、供水、农业间接资本等所有公共服务。经济学家 P·H. 库特纳（P. H. Cootner）认为基础设施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仅仅是通向经济增长结局的一种手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W·W. 罗斯托（W. W. Rostow）在其《从经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一书中运用“部门分析法”分析经济增长，得出了“社会基础资本的先行建设是经济起飞的一个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日本学者南亮进也研究了基础设施问题，他认为基础设施可以称为社会间接资本，其核心是交通运输和通信，是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初始条件。世界银行的《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以“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为题，考察了基础设施与发展的关系。报告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具有重大影响，但其考察的基础设施仅仅是指经济性的基础设施。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西方经济理论中对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聚集财富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商业发展与航海、运输、港口等设施是相关联的；降低运费、提高运力以及运输工具的专业化能促进节约劳动，提高生产效率；国家应建立和维持公共事业和公共工程；交通等基础设施因素而造成的成本变动会影响生产布局；公共事业与公共工程影响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等方面。他们关于基础设施对聚集财富的作用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将公共事业和公共工程作为具体对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则提出：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他们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优先投资基础设施才能加速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和罗根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先后在其“大推进理论”和“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提出：要发展经济，政府部门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基础设施部门进行投资，加速经济增长。

2. 发展基础设施是保障经济增长的基础。持有这一观点的是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核心是随后发展基础设施才能保障经济增长。他认为在投资有限时，首先应集中投资于直接生产性活动，然后待直接生产性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积累了一定的收入，再投入基础设施部门保证其持续增长。但他认为优先投资基础设施可能会造成浪费。

3. 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沃尔特·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吸收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熊彼特（J. Schumpeter）的“创新”学说、凯恩斯（Keynes）的宏观经济分析和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 - Domar model）等理论方法。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意义在于基础设施发展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主要内容是：（1）强调随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投入应不断增加；（2）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政府部门应负重要责任；（3）其他部门的发展以基础设施为基础。这一时期关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与非基础设施投资的先后顺序方面。这些研究归纳起来有五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应超前；第二种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与直接生产发展应同步；第三种认为基础设施

投资应滞后于直接生产发展；第四种认为基础设施与直接生产投资交错进行，但基础设施优先发展；第五种认为基础设施与直接生产投资交错进行，但直接生产投资可优先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步形成，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益方面。具体研究有：（1）基础设施对刺激生产和生产率增长的作用；（2）基础设施的布局形成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基础设施对成本的影响，基础设施的完善度可以决定一国获得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力。基础设施发展可以促进市场发展。在此阶段西方学者及组织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数量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第一，通过统计数据分析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如世界银行在其《1994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根据部分国家人均基础设施存量的数量如何随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的统计资料分析得出了一个简单结论：基础设施存量增长 1%，GDP 就会增长 1%；第二，通过建立一定的计量模型分析某一具体基础设施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 Hudson（哈德森）和 Haas（哈斯）（1997）采用 LPR（每千名居民拥有的公路长度）作为自变量，由 PGNP（人均 GNP）表示 GNP 的因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美国 and 98 个发展中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也有些学者利用 Cobb - Douglas（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资本分为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建立对数回归模型对基础设施的贡献进行了分析。这些学者的计量分析主要集中在：一是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贡献作相对分析；二是利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指标利用生产函数建立模型进行分析。

在中国，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经济理论工作者开始加强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1981 年钱家骏、毛立本开创性

地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入了“基础结构”这个概念，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量化致使人们对它不够重视，应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基础设施的滞后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日益严重。因此经济理论界着重研究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生成的原因和对策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具体内容有：（1）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樊纲在《论基础“瓶颈”》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和危害，提出了缓解的对策。王辰在其《基础产业“瓶颈”制约：体制与非体制的系统的考察》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与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结伴而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被迫进行调整。他认为形成基础设施“瓶颈”的主要原因是：从基础设施自身来说，是需求压力与生产能力的经济技术障碍，从体制来看是比价关系和发展战略的深层制约，是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青黄不接”。张中华在《论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的原因及对策》一文中，在阐述自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提出实施优先发展基础设施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础设施投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的现实时，指出我国基础设施相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市场化进程滞后于整个经济包括加工工业的市场进程；（2）基础设施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刘立峰在《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投资比例关系研究》一文中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动与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有紧密联系，提出了对不同历史时期投资结构合理性的判断方法。赵坚在《试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与基础设施的关系》一文中，通过对社会间接投资与直接生产活动的数量关系的建模分析以及二者之间的结构效率的定量分析，认为发展基础设施可以加快经济增长，并提出了发展我国基础设施的思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王延中研究员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我国跨世纪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的关系实证研究》中，在计量分析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基础设施与制造业的发展，交通运输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与制造业的关联效应，能源设施与制造业发展，基础设施投资与原材料工业发展关系和制造业效率，同时也分析了基础设施区际差异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3）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罗明义在《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基础设施建设》中论证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关键。李泊溪、刘德顺在《中国基础设施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区域比较分析》中，分析了我国基础设施水平的区域差异，认为对区域收入差异影响较大的基础设施是那些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和影响劳动者的区域和企业选址的基础设施类型；（4）基础设施的政府管制。王俊豪教授通过分析英国基础设施政府管制研究，具体分析了中国政府对基础设施体制的改革和管制。此外，1999~2003年连续4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联合举办“中国基础领域改革国际论坛”，主要对中国基础设施领域竞争机制建立、投融资体制改革、基础领域市场开放、反垄断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为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决策建议。国内的定量分析研究较少，主要有以下一些：一是利用国民收入法计算分析，给出了基础设施投资贡献率的度量。例如，国家计委投资公司在《“十五”时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课题中对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测定；二是利用基础设施资产存量指标和生产函数定量分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行了测定。如辽宁大学教授马树才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测算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基础设施存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些研究并没有全面反映每年基础设施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即从每

年基础设施的增量角度，综合测量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二、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内外经济学家关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大部分研究仍然是初步的，不够深入，还存在不少的薄弱环节。主要问题是：

1. 有关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多数散见于一些文章或研究报告之中，专门、系统、全面地分析的专著比较少。

2. 多数分析还局限于一些对策性研究，还没有上升到经济理论的高度给予理论上的有力解释。

3. 特别在数量分析方面更为薄弱，很少有人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计量分析。

第三节 本书的理论贡献及主要内容

一、研究的难点与理论贡献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问题是一项难度相当大的研究课题。一是因为我国对基础设施投资统计信息的不完全性，因而获取资料相当困难，尤其是关键项目的投资资料甚至是属于机密。显然本书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收集统计资料的，虽然还是不很全面，但基本上满足了研究的需要，但也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难以至善至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庞

大的问题，研究时很难考虑到所有方面，只能取其中一个方面展开分析，因而只选择了其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作为研究的主题，尽量能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加以研究。

在经历艰苦而又漫长的研究后，本书在分析和克服以上难点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点：

1. 从经济学角度通过定性分析，系统论证了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成本效应、结构效应与环境效应四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与间接推动作用。在基础设施投资的效应上进行了一定理论分析。这是本书分析的基础部分。

2. 利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资料，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量规模及其变化趋势、投资的时间结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大量详细的实证分析，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实证分析是本书的又一大特点。

3. 采用 ECM 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及其东、中、西三大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推动效率大小，比较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中国与世界（一般情况下）以及三大地区之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大小。在定量分析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有益研究。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安排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提出全书的写作主题、研究意义、前人的研究现状与问题、研究思想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在此部分，首先，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在各地区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分布不均衡，是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基础设施好的地区经济发展快，而基础设施差的地区经济发展慢。因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是政府及其

投资者们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决策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由此而提出本书研究的主题。并指出了本书研究主题的意义在于它能为评价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性，优化投资政策和制度安排，为实现中国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其次，对国内外经济学家关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重点阐述了早期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世界银行专家以及国内经济学家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思想、理论观点和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础设施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章最后，笔者详细地说明了本书的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与分析方法。

第二章是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本章是本书主题的相关基础理论阐述。首先，对本书研究中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也明确了本书研究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范围，即基础设施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次，笔者对一般投资理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主要理论进行了综合论述。作者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理论综述后，将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理论上概括为三个方面：财富论、结构论和效益论。财富论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能集聚，基础设施被看作是财富增长的投入和手段，基础设施的分布影响生产布局，影响国家财富分布，公共事业与公共工程等社会基础设施影响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为了促进财富增长，国家应担当建设公共事业和公共工程等基础设施的职能。结构论认为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两者关系的协调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发展基础设施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保障，加速经济增长必须先加速投资基础设施。效益论重点论述基础设施在提升经济发展效益的作用。

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发展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好坏会影响生产成本高低，基础设施状况影响投资环境的竞争力和市场的发展，基础设施状况影响投资环境的竞争力和市场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布局会导致地区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最后还对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第三章是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本章从理论上对推动作用和制约作用这两方面对基础设施投资作用进行了定性分析。分析推动作用时主要分析了其直接推动和间接推动作用。直接推动作用是指基础设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门，其本身所创造的产出（增加值）的增加，直接引起国民财富（GDP）的增加。研究显示，随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直接推动作用在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的间接推动经济增长作用具体表现在：（1）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2）基础设施发展既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能减少管理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3）基础设施投资能减少交通成本，促进专业化生产与加速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增长；（4）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扩展和优化环境，抵抗环境灾害，减轻不利环境因素对人类生产与生存的影响，抑制人类的有害行为。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是指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足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对经济增长形成的抑制作用。主要是指其投资规模小，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引起经济增长减速；投资结构不合理形成部分基础设施短缺与部分过剩，既制约生产发展，又造成资源浪费，导致资源配置效益低下，影响经济发展；地区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会引起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差距扩大，引起社会不稳定。

第四章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现状及问题分析。本章主要是对中国基础设施水平、投资规模、投资结构进行实证研究。然后提

出了存在的问题。首先，主要从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教育科技，环境与卫生，社会福利等六方面设施阐述了中国当前基础设施水平现状，并与一些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次，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的变化趋势与存在的问题；第三，从时间结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并指出存在的问题。

第五章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计量分析。本章首先从基础设施水平和基础设施的增量投资两方面分析其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基础设施增量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大小。从对中国基础设施水平与经济增长相关分析来看，一是几乎是所有类型的基础设施都与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二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三是从地区分析看，东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中西部地区相对低一些。从相关分析中还表明基础设施投资有很强的滞后效应。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及其东中西三大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了计量分析。利用模型，对中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推动效率和对GDP的影响形式进行了分析。

第六章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相关制度及政策。本章就中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建设制度和政策选择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基础设施投资主体与方式两方面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进行了分析；其次对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特征与制度激励机制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定的制度设计原则；最后在对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政策进行分析基础上，就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沿革和存在问题进行阐述，分别对基础设施的投

融资、技术、建设管理、区域投资布局、价格等政策选择提出了若干建议。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与分析方法

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统一

经济学研究方法以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为最普遍。规范分析是关于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 (what it should be) ” 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体系；实证分析是关于经济现象“是什么 (what it is) 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体系”。本书特别重视对有关经济现象的实证分析，力图把规范分析建立在真实、具体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但笔者也认为，经济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实证分析阶段，是很不够的，甚至是无意义的。这是因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经济利益、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科学，如果仅仅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所搜集和描述的种种经济数据和运作轨迹，不进行引申的规范分析，离开人对经济现象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经济分析就失去了基本前提和存在的意义。经济学是致用之学，是指导经济实践的经济理论，必须提出包括经济政策建议在内的规范经济研究成果用来指导经济实践，以推动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总之，实证分析离开了规范分析就失去了分析的意义，规范分析离开了实证分析，就可能陷入主观臆断，倘若据此应用于实践，则可能贻误经济发展。本书特别注重实证分析方法与规范分析方法的紧密结合，以实证分析所揭示的经济关系和所描述的经济过程进行规范分析。

二、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

本书理论体系的分析过程，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首先分析基础设施的基本概念与分类、基本特征，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本概念、分类，然后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理论，再对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展开定性分析，最后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计量分析，再提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建议，形成了一个大致完整、合乎逻辑的理论框架。

三、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

通过定性分析建立系统总体及各子系统的概念模型，并尽可能将它们转化为数学模型，经求解或模拟后得出定量的结论，再对这些结论进行定性分析，以取得认识上的飞跃，形成解决问题的建议。

根据需要，本书还运用了其他一些分析方法。比如，部门分析法，以基础设施产业作为一个部门，对该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进行分析。可以说，本书对基础设施产业的分析，就是运用部门分析法研究。本书还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比较发现问题与差异，找出解决问题的较好途径等等。

第二章 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第一节 基础设施涵义、分类及特性

一、基础设施涵义

基础设施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开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在现在的经济学文献中，基础设施已经是一个高频率使用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使用频繁，但人们对它的涵义还是存在多种理解和认识，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一）国外学者对基础设施涵义的认识

自从 20 世纪 40 年代发展经济学家首先提出基础设施概念以来，许多国外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

平衡增长理论的先驱、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在其最著名的《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一书中首先提出基础设施这一概念。他认为基础设施是社会先行资本，是在一般的产业投资之前，一个社会应具备的基础积累。它包括诸如电力、运输、通讯之类的基础工业，这些基础工业必须优先于收效快的直

接生产投资，它是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结构，是国民经济总体的分摊成本。

姆里纳尔·达塔-乔德赫里在评述先驱罗森斯坦-罗丹的“平衡增长大推进”理论战略思想时，阐述了自己对基础设施概念的见解。他认为，基础设施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基础设施是指公用事业的“硬件”，如运输和通讯、电力生产与供应、供水排污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农业灌溉系统以及管水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广义的基础设施除了包括狭义的基础设施外，还包括教育、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等。

艾伯特·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对基础设施作了较深刻的分析，他将资本划分为直接生产资本和社会间接资本，基础设施属于社会间接资本。把基础设施定义为那些进行一次、二次及三次产业活动不可缺少的基本服务。他认为，在广义上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秩序、教育、公共卫生、运输、通信、动力、供水以及农业间接资本如农业灌溉、排水系统等所有公共服务。狭义上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港口设备、公路、水力发电等项目的投资。但他认为基础设施的核心是交通和动力。他还认为一项经济活动是否属于基础设施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在某种意义上看，该活动提供的劳务有利于或者是其他许多经济活动进行的基础；二是在所有国家，这种劳务都是由公共团体或私人团体免费提供或按公共标准收费提供；三是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不能从国外进口；四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具有技术上的不可分性和较高的资本产出比。具备前三个条件的是广义的基础设施，符合以上四个条件的是狭义的基础设施。

P·H. 库特纳认为：通常所说的基础设施包括三个方面含义：一是为工业生产服务；二是这种服务是难以流动的；三是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具有突出的规模经济性和持久的耐用性。